

介休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介休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介休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委员名单

主任 董方

副主任 孔繁成

委员 续中元 师延龄

展屏 常秉魁

封面题字 张 颌

封面设计 方 兴

封面摄影 梁雨生

封面篆刻 李 刚

编 辑 董 方

孔繁成

校 对 温雅琴

印 刷 介休县印刷厂

整理史料
惠后人

李修仁

二〇一〇年七月

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同志题词

反史可鑒
建往并
史

張松齡

五
月
廿
日

中共介休县委书记张松龄同志题词

广征精集
鉴昔益今
郭升恒

介休县人大主任郭升恒同志题词

珍塔·才更治拜

服务四化建设

赵希宽

介休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希宽同志题词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坚持实事求是精神

好文史资料工作

杨恒禄

一九八二年

介休县政协主席杨恒禄同志题词

前 言

《介休文史资料》现在出刊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介休文史资料》是政协介休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内部刊物。其宗旨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为四化建设、统一祖国的伟大斗争服务。

介休历史悠久，山河秀丽，占有“三贤故里”（介子推、郭林宗、文彦博）之美称。在近代史上，介休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推翻反动统治、建设新中国、争取人民当家作主的斗争中，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经受了艰巨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些都是应该大书特书详尽整理记载的。

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件教育人民惠及子孙后代重要的工作，我们研究编辑地方文史资料正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为此，殷切希望各界人士重视和支持，尤其希望各方面有阅历的老一辈人士积极投入这项工作，为地方文史资料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政协介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回忆牺盟会.....	薄一波（1）
介休牺盟会的建立和武 装斗争的开展.....	李志敏（15）
我在介休任村政协助员 的回忆.....	燕登甲（27）
介休牺牲救国同盟会的 创建经过.....	秦 平（32）
抗战初期我在介休工作 的回忆.....	赵力之（34）
介休牺盟会的一些情况.....	郭云鹤（35）
山西建立牺盟会和介休 牺盟会的一些情况.....	张家俊（39）
我任村政协助联络员的经过.....	高 镇（42）

我记忆中的介休牺盟会·····	王 文 (44)
介休县大靳村牺盟会	
中心支部简介·····	王脂岩 (47)
介休“主张公道团”概况·····	张 凡 (51)
介休牺盟会建立之前后概况·····	任立身 (58)
介休的一支“抗日学生兵”·····	纪一欣 (60)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回忆我的革命战斗历程(节录)·····	马亚宁 (62)
小资料·····	(63)
介休地名拾趣·····	(66)
征稿启事·····	文史资料委员会 (85)
编辑要点·····	文史资料办公室 (86)
编后话·····	编者 (87)

回 忆 牺 盟 会

薄 一 波

我们聚会来纪念牺盟会成立五十周年，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牺盟会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策略的产物，它作为我党领导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在抗日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上百万的牺盟会员和山西新军的干部、战士，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过英勇斗争。有一万多位同志在斗争中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他们。为抗日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下面，我想借这个机会对牺盟会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并就几个问题谈点看法，和大家交换意见。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抗日斗争光辉史册的重要一页。成立牺盟会，最初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团体的核心组织）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的。成立不久，由于种种原因，陷于停顿。我们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接手之后，就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方针和策略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方针和策略，具体领导了牺盟会以及后来建立的山西新军的斗争。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是北方局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派我们几个人到山

西工作时决定成立的，它直接归北方局领导。最初的成员是杨献珍、董天知、王钧、高仲英同志和我，由我担任书记。这个委员会，专门做抗日救亡工作，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队上层抗战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得名叫公开工作委员会，在组织上则是秘密的。按照北方局的規定，它由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月后改为中共山西省委）不发生横的联系。公开工作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组织，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委员会的成员陆续又增加了十一位同志，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来的，他们是：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关、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当时在党内只有极少数同志知道有这个组织。我所以要先讲讲这个委员会，是想指出我们党领导牺盟会和决死队，主要不是依靠哪个人或哪几个人，而是通过这个组织来具体实行的。牺盟会的成就，是几千几万同志共同奋斗得来的。把握住这一点，对于正确了解 and 撰写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历程，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即创造阶段，大发展阶段，反磨擦阶段，以及“十二月事变”后的那个阶段。在那三个阶段里，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牺盟会继续活动小约一年，而山西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后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每个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工作重点和策略运用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阶段，大致是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在这将近一年里，我们接手并改组了牺盟会，开展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特别是训练军政干部，组建新军的工作。这期间，我们的工作主要放在站稳脚跟，抓住实权，推动抗日上。

一九三六年，日本正加紧侵略华北，阎锡山在山西的长期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蒋介石策划河套独立，企图夺取这块地盘，红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主席曾致书阎锡山敦促其联合抗日。在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山西当局的上层内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分化。这时，阎锡山构想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打着山西的旗号，仿照共产党的某些措施，采用这种办法来应付时局危机，度过难关。从我们党来说，在蒋介石拒绝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利用山西出现的形势，突破一点，去影响全局，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推动阎锡山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发展。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阎锡山邀我回山西工作的。经北方局批准，我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作为抗日救亡人士应邀来到太原。动身前，我向北方局汇报了九月间先回太原所了解的情况，认为在那里可以有所作为，并提出了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首先要站住脚跟，不作“清客”，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能接受的事情，踏踏实实

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批准。

到太原后，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依照上述工作方针的精神，向阎锡山提出了三点要求。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作客，按照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开始，我们逐步地同阎锡山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阎锡山知道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营救”我出狱并邀我回山西工作时，郭知道我们在监狱中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的。郭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牢多年，后投靠了阎。我同他在草岚子监狱见面时，开始还不知道他已是阎的人，曾告诉他党组织正营救我们出狱，他回去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阎。后来，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张厉生也一再向阎锡山通报过我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阎那时已倾向于抗战，他正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替他打开点局面，完成所谓“深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 and 利益。阎锡山自信他能在这局险棋中赢得最后胜利。我们也明明知道，

阎锡山不可能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暂时同盟，我们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也深信，依靠党和群众的力量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同阎锡山合作，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工作并发展抗日力量，就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么办？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用了不少“远方朋友”介绍来的人，阎锡山清楚这都是怎么回事。一九三七年初，我经过北方局向党中央要求陈玉堂、苏鲁、孟庆山、黄振荣、白书祺等十位红军干部，放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由周仲英同志管的那个连，被梁化之发现了，他气急败坏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明确告诉他，要来的这些人是红军干部，是请他们教学员们打游击战的。阎知道后，没有责难，认为我们讲真话，不骗他，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工作初期，我们是十分谨慎的，尽可能地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办山西当局所允许办的事。赵戴文当着阎的面提出过，要求我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脚，我们同意过，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在山西当局的政府和军队中发展党员。当时这样做做对了，它便于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否则就站不住脚。

如何对待和处理戴“山西帽子”和“官办团体”问题，是这个阶段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曾有过争论，在我们接手牺盟会之前，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官办团

体”不能发动群众抗日，力主把牺盟会更名和改造为抗日救国会，把由我们组织起来的山西抗敌救亡先锋队，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没有照办，引起了争论。刘少奇同志得知后，明确指出：牺盟会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官办”的，否则就不会让我们放手工作。把牺盟会和抗敌救亡先锋队改为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阎锡山不准许，我们不能那样办。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张友清同志汇报工作时曾代表我们两人提到这个争论过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批评了那种反对“官办组织”的意见。决死队建立不久，又有的同志坚持说，戴阎锡山的“帽则”是违反独立自主原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反对了这种意见，他们强调指出：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戴“山西帽子”，戴这顶“帽子”对于我们没有妨碍，而且有许多便利。

总之，主要是在抗战以前的这个阶段，当时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最后形成，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公开工作委员会审时度势，小心谨慎地运用阎锡山的进步口号开展工作，着重反对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十分注意团结阎锡山，推动他走向抗战，斗争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拉阎锡山后腿的“山西省主张公道团”等右翼力量。我们正确地运用和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个“官办团体”，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阶段的大发展，大致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二月。我翻看最近出版的《牺盟会和决死队》那本书时，发现前言中把这个阶段的开始时间“一九三七年八月”，误